

藉着社會政治參與塑造靈性生命

林崇智牧師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一) 引言：

上帝的愛是循道衛理宗信仰的核心；是本宗神學的根基；是我們使命的動力，因為「所謂循道衛理教義……這古老的信仰不外乎愛，對上帝和對世人的愛……這愛乃是生命中最大的良藥，是對一個失衡世界的所有邪惡，以及人的一切痛苦和罪行永不失敗的補救。無論哪裏有了這樣的信仰，那裏就有美德和幸福結伴隨行。」¹所以任何屬靈操練目的，都是為了幫助人確認和經歷上帝對我們的愛，並加深我們對上帝、對自己和對別人的愛，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藉着聖靈在我們生命中工作的成果。由於本宗強調上帝道成肉身，進入我們的生命和生活中，故此我們對靈性生命塑造的理解，絕不是建基在生活中某些個別抽離的活動或某些獨特的時刻，而是強調在日常生活，我們每天殷勤地使用各種「蒙恩途徑」(Means of Grace)²，藉着敬虔的工作(Works of Piety)和憐憫的工作(Works of Mercy)，不斷的活出「稱義和成聖」生活，在個人和社群層面中，效法基督在愛中與上帝同行，我們靈性的生命便得以逐漸建立起來。

(二) 靈性生命塑造與蒙恩途徑

循道衛理宗所強調的基督徒信心，必定是一份「使人發出仁愛的信心」(加 5:6)，而我們所着重的基督徒完全，也就是「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以及「愛鄰如己」(太 22:37-39)。正如上文提到，這份愛不是人的功勞或成就所產生，而是一份恩典禮物，是聖靈先將上帝的愛傾倒在我們心中，我們才能活出滿有愛心的聖潔生命。人所領受的愛，是藉着使用蒙恩途徑來維持和帶來增長，那麼蒙恩途徑是甚麼？「蒙恩途徑是上帝為了祂指定的目的所設立的外在記號、言語和行動……上帝通過這些「常設途徑」(Ordinary Means)，把預設的恩典、稱義的恩典和成聖的恩典賜給世人。」³蒙恩途徑幫助我們經歷上帝的

¹ 衛斯理約翰(下稱衛斯理)講章 第 112 篇「為新教堂奠基」“*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Chapel*” (1777)。

² Paul W. Chilcote ed. *Wesleyan Tradition: A paradigm for Renewa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2), 88。史提夫哈伯(Steve Harper)的文章指 Albert Outter 認為這名詞是出於 1662 年聖公會公禱書的大祝謝文。

³ 衛斯理講章 第 16 篇「蒙恩途徑」“*The Means of Grace*” (1746)。

同在，領受能力，讓上帝進入我們生命中工作。我們得救絕不是靠着這些途徑，因為「上帝可以無需通過任何途徑直接賜恩給你們，然而你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祂會這樣做。因此你應當用心，不斷地使用所有蒙恩途徑。」⁴衛斯理約翰（下稱衛斯理）深信上帝為渴慕生命成長的人，賜下常設的蒙恩途徑，也稱為「敬虔工作」，但信徒要對上帝的恩典作出負責任的回應，生命才能成長。⁵衛斯理的教導是，

「上帝和聖靈不受任何局限，不同的人怎樣按照指引，又怎樣獲得上帝的恩典是多元化的、交錯的、綜合和多姿多彩的；我們的智慧告訴我們，要順服上帝的旨意和聖靈的引導（尤其是尋找上帝的恩典途徑）.....，聖靈是樂意和自由地通過這些途徑在我們心中動工。故此渴望上帝救恩的人..... 要抓住每一個機會，使用上帝所指示的一切途徑。因為有誰曉得上帝會選用哪一個途徑賜恩典給你？」⁶

然而當衛斯理的信仰逐漸成熟，他理解蒙恩途徑除了常設的，有規範性的一面外，同時也有非常設，開放性的一面。一些經過教會群體慎思和印證的活動，確信上帝的恩典能藉此傳遞給人，衛斯理稱這些是教會設立的「審慎蒙恩途徑」（Prudential Means of Grace），也就是「憐憫工作」。

「我們常指蒙恩途徑就是那些敬虔的工作，如讀經、領聖餐、公禱和私禱、禁食等，但那是否唯一的方法，有沒有其它方法令上帝喜悅.....能傳遞祂的恩典？.....當然有，就是憐憫工作，它與敬虔工作一樣，都是真實的蒙恩途徑。」⁷

在教會長大的信徒，對常設的蒙恩途徑絕不陌生，但有意識和殷勤的將關心窮人，實踐善行，甚至爭取社會公平正義，這些個人和社會層面的道德生活看為蒙恩途徑來塑造靈性生命，相信還不是本宗信徒所重視的，這等疏忽和偏差，卻是衛斯理晚年愈來愈關注的。他深信慈善工作和爭取社會公義，不單是基督徒愛心的結果和聖潔生活的證明，同時也是培養信徒屬靈品德，滋養聖潔生命的重要途徑。所以他提醒信徒「不要讓愛像一個過客般地訪問你，而是要成為

⁴ 衛斯理講章 第 37 篇「熱心的本質」 “*The Nature of Enthusiasm*” (1750)。

⁵ Paul w. Chilcote ed, *Wesleyan Tradition*, 史提夫哈伯的文章 “*Work of Piety as Spiritual Formation*” 頁 87-97 一文有詳盡描述。循道衛理宗強調的恩典是人要作出負責任回應，衛斯理的恩典神學，基督徒生命成長。建基在兩個原則上 “*First ,God works; therefore you can work, secondly ,God works, therefore you must work*” 。

⁶ 衛斯理講章 第 16 篇「蒙恩途徑」(1746)。

⁷ 衛斯理講章 第 98 篇「論探訪病患者」 “*On Visiting the Sick*” (1786)。

你靈魂持續不變的性情，要留心讓你的仁慈……不僅是對那些愛你的人，更要同樣的對待每一個人。」⁸他為追求活出基督徒愛神愛人生命的人，寫了著名的講章《錢財的運用》⁹。他定下三條重要原則：（1）「盡你所能賺取」，（2）「盡你所能節省」，（3）「盡你所能的施捨」。因為不合信仰的使用錢財，會破壞基督徒追求生命的聖潔，引至我們與他人生命割離，帶來不良的結果：

「你會為他們工作，但你不會與他們同工。你的心會為他們流血，但你的理智和雙手不會為他們流血。你會為他們仗義直言，但你卻不會成為他們的摯友。你會贊助他們，並支持他們的運動，但是他們的運動，不再是你的運動。」¹⁰

憐憫工作就是愛我們的鄰舍，具體行動包括：「我們所說，所做和所給予的，使我們鄰舍的身心得益，就如把食物給饑餓的，把衣服給赤身露體，幫陌生的人，探望患病或在囚的，安慰受痛苦的，教導無知的，責備行惡的。」¹¹衛斯理順着聖經教導，開展了許多濟貧扶貧事工，然而他不看這些工作只是一種付出，而是看為信徒得着生命和恩典的途徑。所以他要求信徒有規律的探訪病人、窮人和囚犯。他說：「親自帶救濟品給窮人，比寄救濟品給他們好……，因為這樣可以軟化我們的心，使我們自然而然彼此關懷」。¹²探訪能夠「增加我們對受苦者同情的心，加強我們的仁慈以及我們對社會的愛心」，¹³沒有親身參與，「你就無法增加你的謙卑、忍耐、溫柔以及你對受難者的同情心，這是你通過親身幫助他們才能得到的」¹⁴。故此親身參與憐憫工作，能幫助我們帶着上帝的眼光和心腸，回應困苦者的需要，也能站在困苦者的處境，為他們說話，我們的屬靈品格便漸漸建立起來。

衛斯理清楚的指出，個人層面的憐憫工作，諸如「探訪窮人、病人和囚犯，與公共和私人禱告及守聖餐並列，是同樣重要的蒙恩途徑」¹⁵，但當我們為受壓

⁸ 衛斯理講章 第 100 篇「討眾人的喜悅」“*On Pleasing All Men*”（1787）。

⁹ 衛斯理講章 第 50 篇「錢財的運用」“*The Use of Money*”（1760）。

¹⁰ Lovett H. Weems, *Pocket Guide to John Wesley's Message Toda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2), 79。

¹¹ 衛斯理講章 第 26 篇「登山寶訓之六」“*Up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VI*”（1748）。

¹² 衛斯理，《衛斯理約翰日記》（下稱日記），許碧瑞譯（香港金陵學院託事部/基督教輔本僑出版社，1956年初版）。1760年12月24日。

¹³ 衛斯理講章 第 98 篇「論探訪病患者」（1786）。

¹⁴ 同上。

¹⁵ 衛斯理講章 第 92 篇「論熱誠」“*On Zeal*”（1781）。

迫的人發聲，挑戰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政策和制度，謀求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公平、公義的社會，這些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憐憫行動¹⁶，對基督徒來說，是否也可以成為塑造聖潔生命的蒙恩途徑，與常設的蒙恩途徑並列？衛斯理在這方面沒有作出任何論述來表達他的觀點，相信當中必定有一些特別的原因。¹⁷但對研究衛斯理的人，是不應停留在他的觀點上，而是應循着他的腳蹤，繼續前行，作他當年沒有做，卻是應當做的事。相信他也不想我們將自己局限在他當年所發現的有限「真理」內。

今天我們看到衛斯理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因着那些踐踏人性尊嚴，帶來巨大痛苦的罪惡奴隸制度；因着要保障自由，這份上帝給予任何人的神聖權利；因着經濟制度向有錢人傾斜，而出現對窮人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衛斯理不斷地出版文章和小冊子，痛斥時弊，為社會的公平正義發聲，這些行動，必定是與他一生追求的聖潔有關的目標。衛斯理選擇以論政方式，作出他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抗爭，這當然有特殊原因。他確實沒有策劃任何社會行動，但這些深入人心、挑戰良知，以行動為導向的「基督徒抗爭文學」¹⁸，卻激勵和支持許多讀者們為真理和公義奮鬥，間接帶來最終的社會改革。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公民社會，信徒愈來愈多機會和需要作出社會性和政治性參與，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仍是一個罪惡世界，罪惡的權勢往往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等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奴役踐踏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使人失去人性的尊嚴。不公平和不公義的制度，迫使不少基督徒，沒有選擇的只能以抗爭形式宣講真理¹⁹，以行動來作出「願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禱告，故此社會和政治的參與是有信仰的需要和充滿屬靈的向度。當我們為信仰，帶

¹⁶ David Lowes Watson, *Forming Christian Disciples*, (Nashville, Discipleship Resources, 1995) 8-12。將衛斯理推動的班會改為現代的「盟約門徒小組」，而班員活出聖潔生活的指引總綱（*General Rules*, 1743）包括敬虔工作（*Works of Piety*）和憐憫工作（*Works of Mercy*），現代化的改為個人和群體兩個層面，敬虔工作包括靈修和崇拜，憐憫工作包括個人愛心關懷和爭取社會公義。

¹⁷ 衛斯理一方面相信個人生命的改變，最終必定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改變，另一方面他對當時建制政府很有信心，反而認為一些激進的社會性和政治性訴求行動，將會帶來社會動亂，結果反而失去既有的，很艱才得到的自由和人權。而且他參與論政的時刻，正是英國社會充滿內憂外患時刻，循道衛理運動早年被誤解和攻擊剛告一段落，他絕不會鼓勵信徒參與社會和政治改革，再次引來被誤會擾亂社會，帶來攻擊。甚至信徒的參與可能使復興運動被激進份子騎劫，破壞爭取已久才擁有的人權自由。

¹⁸ 「基督徒抗爭文學」是基督教一個很強的傳統，以小冊子和其他文字出版來對抗教會和人類社會內外的問題或錯失。博克米爾博士（Dr. Klaus Backmuehl）為推崇這傳統而寫了一本名為《書籍—上帝在救恩歷史中的工具》的書，認為這些小書甚至成為改變人類命運和面貌的催化劑。參加里托馬斯著，除永財譯《與神相遇》（基道出版社，2007），頁 121。

¹⁹ Francis August Schaeffer 曾寫道：「有時真理等同對抗」，取自《與神相遇》，頁 122。

信心和愛心參與這些行動，它們會成為上帝施恩與人的途徑，幫助我們塑造和建立愛神愛人的聖潔生命！

(三) 衛斯理約翰委身的社會政治事務

衛斯理認為政治是十分複雜，政治行動的背後，皆由很多難以知道，不能隨便相信的隱藏利益所推動。由於他不是政治專家，所以他對政治是「無知」的，他對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否正確、是懷疑和有所保留²⁰。因此 1768 年，衛斯理寫信給一位朋友表示：「我不是政客，政治的事我並不十分關心……，我並不博學……，我不確定任何事情……然而，你既然希望我告訴你我的想法，我願意盡量公開……只是我不負上責任」。但是這位行動主義者所強調的信仰：「除了社會聖潔外，再沒有聖潔……將基督教變為個人的宗教，會將基督教摧毀」²¹和現實環境，令他很快離開了他的立場。

(1) 英美民主訴求

在英國十八世紀 70 年代，復興運動遭遇暴徒的攻擊愈來愈少，但英國社會卻愈趨動盪，充滿內外危機²²。衛斯理在這時刻，一方面要努力鞏固運動的發展，處理與加爾文主義者的持續爭論和回應運動的繼任問題，但另一方面，他積極的介入當時充滿爭議的社會和政治事務，不斷發表對權力、民主、自由、人權、改善貧窮的意見²³，他也呼籲全國為國家危機禁食禱告²⁴。表面看來，衛斯理是

²⁰ 衛斯理， “*The 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1768)。

²¹ 衛斯理講章「登山寶訓第四篇」1748，多次提到衛斯理所強調聖潔信仰，不可能只停留在個人層面的讀經祈禱，而必須在群體關係中才能建立，成長和實踐出來。這個「群體聖潔」的觀念，在本宗很快便變成以愛上帝愛鄰舍的心，尋求社會的公義和社會的改革。

²² 18 世紀 70 年代的英國充滿內憂外患，工業革命出現的通漲和失業，引致大量草根階層的民憤，國內湧現追求分享更多權力的激進勢力，英國同時要面對美洲殖民地要求獨立的戰爭，歐洲諸國借機會與英國宣戰，如愛爾蘭 1778 謀求獨立，英格蘭 1779 發生反英暴動，法國和西班牙借機與英國宣戰，1780 年法軍登陸羅德島，荷蘭也加入對英國宣戰，巴爾幹半島各國拒絕提供英軍需品等等，令英國內外形勢岌岌可危。

²³ 衛斯理在 70 年代開始，發表大量論政文章，包括 “*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1768)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Power*” (1771) “*Thoughts Upon Liberty*” (1772)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Provisions*” (1773) “*Thoughts Upon Slavery*” (1774) “*A Cal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 (1775) “*Some Observation On Liberty*” (1776) “*A Seasonable Address to the More Serious Part of the Inhabitans of Great Britain*” (1776) “*National Sins and Miseris*” (1776) “*A Calm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England*” (1777) “*A Serous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with Regards to the State of the National*” (1778) “*Property Calmly Considered*” (1779) “*The Mystery Iniquity*” (1780)。

²⁴ 衛斯理在 1775 年寫信給殖民地大臣達特茅斯伯爵 (Earl of Dartmouth)，威廉諾治要求他向國皇進言，舉行全國性禁食祈禱，他寫道「國家現時已困難重重，不知還有多少會接踵而來，我們能否完全脫身呢？……我們是否肯定連上帝的幫助都不需要呢？……何不效法我們祖先，在公眾場合肅敬禁食禱告？……除了閣下，還有誰會向國王提出呢？結果英國在 1776-1779 期間，每年均舉行一天全國禁食日，而衛斯理也另在這幾年的八月，在本宗內舉行國家禁食祈禱日。

一個對「民主」絕不支持的人物，他反對當時愈來愈多人支持「政府的權力是來自人民」(洛克 John Locke) 的觀點，認為「從理性和歷史的分析，都沒有政府的權力是來自人民這回事。政府的權力是來自上帝，但上帝將這權力托負給人，所以除了上帝外，別無其他權力」(There is no power but of God)²⁵。他認為那些在英國本土追求民主的人，尤其是以維克斯約翰 (John Wilkes) 為首，反對喬治三世的激進派人士，在議會內外煽動市民，引發動亂，要求解散國會進行普選的人，最後只會帶來既有的人權和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暴民統治。他的經驗是當他與一群跟隨者在露天佈道時，多次因着喬治三世的君主立憲政府有效地控制暴徒動亂，恢復國王管治的秩序 (the King's Peace)，群眾的公民和自由權利才得到保障。在各種自由中，他最關注的當然是宗教自由，包括不受壓迫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發表自由，衛斯理進一步表達：

「信仰上的自由乃是關於我們選擇自己信仰的一種自由。根據我們自己的良心，根據我們所擁有的最佳亮光來敬拜上帝的自由。任何一個活着的人，都有這樣的權利，因為他是一個有理性的受造者。每一個人必須為自己作出判斷，因為每一個人也必須在上帝面前交帳。這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它跟人性是不能分開，上帝亦從未授權任何人剝奪別人的權利，不管那些人的膚色是甚麼。」²⁶

他在評估各種政治制度後，認為當時君主立憲政府所推動的宗教容忍政策，是最能保障英國人所享有的秩序和自由，勝過全歐洲其他國家²⁷。故此他十分懷疑，甚至抗拒當時高舉的民主訴求。

衛斯理初期對美洲殖民地的訴求是較為同情²⁸，故此他反對英國政府武力鎮壓殖民地的人民，²⁹但當美洲殖民的抗議變成武力抗爭，美洲殖民對自由的訴求

²⁵ 衛斯理，《權力來源的思考》“*Thought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Power*” (1771)。

²⁶ 衛斯理，《有關自由的思考》“*Thoughts Upon Liberty*” (1772)。

²⁷ 同上，內文寫：「在歐洲以及可居住的世界，有那一個國家像英國百姓一樣，享有如此良心上的自由？……並且，也是我們的祖先從征服英倫到光榮革命以來，所未曾享有過的。」另一篇衛斯理寫的文章「就自由的一些觀察」，“*Some observation on Liberty*” (1776)，內文寫：「人民在政府的運作上所享有的權利愈多，這個國家在世俗或是信仰上所享有的自由也愈小。因此在一個有限權力的王朝統治下，我們在世俗和宗教都享有最大自由，在貴族政治下次之，在民主政治下則是最少。」

²⁸ 衛斯理，“*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1768)。衛斯理的立場是明顯地同情殖民者。他批評喬治格倫維爾（殖民官）對殖民地的不合理對待，從法律和公平的原則，都不能給予支持。他認為美國殖民的一些訴求，應獲合法和公正的方式處理。

²⁹ 1775年6月，當美洲殖民與英軍發生衝突，他也寫信給時任總理諾夫公爵 (Lord North) 及殖民大臣達特茅斯伯爵威廉諾治 (William Legge)，認為「美洲殖民只是用最適當，並不冒犯的方式爭取合法和自然的自由權利，不管那是對與錯，我要問：向美洲殖民動武是否一個正當的想法？」

漸倒過來，煽動了英國本土的激進民主運動，可能產生他所憂慮的癱瘓政府，推翻王室，破壞既有人權的「暴民訴求」時³⁰，他在 1775 年 9 月底被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所寫的文章「收稅不是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所說服，便在一夜間改變了他對美洲政局的立場。他寫一本帶來很多爭論，卻極度暢銷的小冊子³¹，甚至獲英國政府印發在教會外免費派發。衛斯理認為美洲殖民的觀點「沒有代表便不納稅」，在道德和法理上並不成立，他們對自治的要求也是不負責任的。但他在日記中指出，真正的威脅卻是在英國本土，「今日的英國正處於火焰當中，一股猙獰的火焰正向着國王和幾乎所有國王的臣僕燃燒，我要奮力撲滅這火焰，每一個忠實的愛國者豈不當一同努力？」³²

衛斯理在報章公開表明他希望平息獨立要求和鼓吹戰爭的聲音，因為人們應看到，要求豁免納稅只是藉口，並不是一件正義的事。但他反對英國出兵美洲，擔心國家因此捲入一場不容易勝利的內戰，也引發激進人士借機在國內煽動叛亂。³³他寫信給英國領導人，呼籲他們通過外交談判來結束衝突。翌年，衛斯理再寫一本小冊子還擊別人對他的指控³⁴。他指出美洲殖民一直享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們指控英國「謀殺和奴役他們」並不成立。現在美洲殖民要求獨立，是基於一種不是真正的民主訴求，因為他們強調，一個人的權利是天賦的，那麼美洲本身卻不是所有人都有投票權（例如：女性、青年、窮人均被排斥在選舉制度之外）。而且，這群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反抗英國的人是十分虛偽，因為他們要求自由，卻容許奴隸制度在其中。最後衛斯理認為這些訴求只會帶來失控和渾亂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再次強調「除上帝外別無其他權力」的觀點。一年後，他出版一本小冊子，認為從美洲高呼要從英國的軛得到獨立，到現在軍事對峙，就像「網中的野牛瘋狂咆哮」，但這行動不會帶來真正自由。他提醒在美洲的「循道友」，應珍惜作為英國公民所享有的公民及宗教自由，在英美紛爭「最艱難的時刻，面對嚴苛的困境，要作和平之子，……盡力協助雙方軟化，謀求和睦，小

³⁰ Theodore Runyon, *The New Creation: John Wesley's Theology Toda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8) 174。

³¹ 這小冊子名為《對美洲殖民地問題平和的說話》“*A cla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 1775 年 10 月出版，是衛斯理對約翰遜文章的撮要和意譯。這小冊子在三星期內便售出了四萬本，英國政府也將之印刷免費派發了十萬本以上。

³² 衛斯理《日記》，1775 年 11 月 11 日（本文日記資料摘錄自杰森，湯姆斯（Thomas Jackson）在 1831 年所編輯的衛斯理約翰書籍（*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³³ Ronald H. Stone, *John Wesley's Life and Ethic*,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1) 179。

³⁴ 衛斯理，《就自由的一些觀察》“*Some Observations On Liberty*”（1776）。

心不要捲入另一場戰爭」。³⁵結果他的「中立」立場引至本宗所有由英國差往美洲的傳道人，被美洲殖民懷疑是王室的支持者，被迫返回英國（亞斯理除外）。

在美洲殖民爭取獨立戰爭期間，衛斯理的論政小冊子讓我們知道的，他真正關心的不是美洲獨立，而是平息英國本土貧富極度懸殊下的民憤，避免國內高舉民主自由的激進造反勢力有機可乘，最後連在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辛苦得來的自由也失去。所以他不願見到美洲和在英國推動「民主」的人得勢。衛斯理的一連串行動，相信有助於英國本土平息那些不滿政府者所製造出來，反國王和反政府的言論。

（2）奴隸貿易

也許我們應知道，衛斯理在介入英國與殖民地紛爭的同時，他也投身在另一項更漫長的政治和經濟鬥爭中，就是反對不義的奴隸制度。早於 1736 年他在美洲傳教時，便在南加州查理斯敦（**Charleston**）造訪了一個慘不忍睹的奴隸市場，由當天起，他便成為奴隸制度的無情敵人，並稱之為「最應受咒詛的惡行之首」³⁶。奴隸貿易是英國邁向工業化和帝國化最不人道、最不公義的社會罪惡。為了配合殖民地種植業勞動人口的劇增需要，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被剝奪人權，像畜牲般被販賣。

「當販奴的船隻抵達港口時，黑奴們再次赤裸裸的展露於買家前，供他們檢驗。之後便被帶到不同的農場，與窮人永遠沒有再見機會。我們看到母親攬著女兒痛哭，女兒攬著父母們，直至鞭手把他們分開。有甚麼會比這更為不人道？他們被迫永遠離開家園，造物主是否要這些高貴的創造，要像牲畜般過這樣的一生？」³⁷

既得利益的政客、貴族、奴隸販與奴隸主、社會大眾，甚至教會都無視這種利潤豐極厚，卻是極不人道的行為³⁸。為着國家小數者利益，王室和國會都為奴

³⁵ 衛斯理，《對英國居民平和的說話》“*A Clam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England*”（1777）。

³⁶ 衛斯理，《日記》1772 年 12 月 12 日。

³⁷ 衛斯理，《有關奴隸的思考》“*Thoughts Upon Slavery*”（1774）。

³⁸ **Manfred Marquardt**, *John Wesley's Social Ethic: Praxis and Principle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2) 67-70。奴隸貿易是 16 世紀初由葡萄牙開始，因着利潤豐厚引致西班牙與英國爭相加入。英國教會除個別人士反對奴隸貿易外，主流觀點是容忍不反對的。倫敦主教也是殖民地的主教，（**Edmund Gibson**）代表教會立場，以保羅的神學（加 3；林前 7；西 3）來反對改變現行的社會制，因為基督徒是從罪惡和撒旦權勢中得釋放，洗禮時是甚麼身份，洗禮後並不需要改變，故他反對美洲基督徒奴隸主釋放已信主的奴隸。經中的舊約和新約都接納既有的奴隸制度，便成為英國教會絕大多數人合理化這種不義制度的理由。時反對這不義制度的教會主要來自非主流的貴格會（**Ouakers**），公誼會（**Society of Friends**）及門諾會（**Mennonite**）。

隸貿易提供法律保障，結果美洲一半以上的黑奴，都是由英國奴隸販所提供³⁹。面對龐大既得利益的經濟和政治集團，若沒有一種普遍被認同的信仰和神學作為反對的基礎和動力，只靠極少量非主流信徒聲音，是沒有成功希望的；而衛斯理鮮明的信仰觀點和堅實的反對立場，便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在整個社會層面要求廢除奴隸貿易的象徵和代表⁴⁰。

1772 年衛斯理閱讀了一本描寫不人道的販賣奴隸的書籍後⁴¹，1774 年，他寫了一本廣泛流傳的小冊子，名為「有關奴隸的思考」(Thoughts Upon Slavery)。這是一篇高舉人權，反對奴隸貿易最具影響力的文章。因為它不是站在本宗神學觀點來呼籲，而是站在一種得到廣泛認同，混合當時人文主義和信仰立場提出來的觀點。這本小冊子分為五部分：第一章衛斯理指出奴隸制度使人類墮落，這制度已在歷史中殒落，但卻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參與復興起來。第二章衛斯理反駁歐洲人的種族歧視，認為非洲人是次等的偏見。他的信仰和經驗都確定，他們不是反叛、愚蠢、無理性、邪惡和懶惰的野蠻人，與歐洲人一樣，他們是「有靈的活人」。第三章衛斯理描寫非洲人在被捉拿、販賣和運送過程中，被視為野獸般受到極不人道，甚至酷刑對待，也引致無數家庭破裂，約三分一的奴隸在運送過程中死亡。這些奴隸沒有法律保障，主人可隨意折磨、懲罰，甚至殺死他。第四章衛斯理駁斥支持這不義制度的觀點。支持者指出奴隸貿易是正當合法的，但衛斯理站在當時高舉的自然律 (Natural Law) 來反駁。奴隸貿易雖然有法律保障支持，但它卻踐踏正義與憐憫原則。自然律所賦予的人權是給全人類，不分種族和國家的，合法並不等於合乎正義，他指出：

「法律能使黑暗變為光明，邪惡轉為美善嗎？終使你有千萬條通過的法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公義與不義，殘酷和憐憫兩者間是天壤之別的，把如此邪惡的事加在完全沒有冒犯我們的人，那是公義嗎？.....我完全不同意擁有奴隸是與公義沒有抵觸。」⁴²

³⁹ 同上，歐洲諸國先後合共將 2000 萬非洲人運送離開非洲。

⁴⁰ 衛斯理參與廢除奴隸貿易的行動，較他關注貧窮和失學的社會問題後，雖然他在美洲傳教已發現這不義的事，但初期他所關心的，是黑奴的教育，他們在牧養和佈道上的需要。不認同社會人士認為黑奴是次等的偏見，所以他一視同人地對待他們。中原因可能是他不想挑戰聖公會的既有立場（他已與教會有很多紛爭），也可能是想挑戰當時法律（因法律給早期復興運動很大的保障）或是參與這反奴隸事工，會為復興運動帶來更多更大的攻擊（運動初期的 30 年，常被受人煽動的暴民攻擊）。

⁴¹ 這本書是貴格會信徒班尼茲·安東尼 (Anthony Benezet) 所寫的三本有關奴隸的書其中一本，在 1771 年出版。他也閱讀了一些其它奴隸主和奴隸販的著作。

⁴² 衛斯理，《有關奴隸的思考》(1774)。

非洲人與歐洲人均擁有同樣的自然權利；謀殺和剝奪別人的自由，在自然律的基礎上絕對錯誤的。他隨即再挑戰另一個觀點，就是奴隸貿易有經濟的需要。既得利益者要避免道德控訴，便只好訴諸國家的經濟需要和益處。他們認為歐洲需要咖啡和蔗糖，但白人不能在酷熱的環境工作，只有黑人才可以。衛斯理反對這觀點，認為同樣的工作環境，白人也能做到，況且我們不能用違背公義和憐憫的惡行來增加我們的利益。支持者問，我們不愛國，不為國家的繁榮和財富着想嗎？衛斯理答：

「智慧、美德、公義、恩慈、慷慨、愛國的心，全都是一個光輝國家所需的，但財富則並不一定。要用邪惡手段來獲取貿易，那就情願沒有貿易了。要用他人的淚水和血汗去換取財富，那就情願安貧了。」⁴³

所以，我們不可為國家的繁榮和財富而違背真理正義。最後一章衛斯理呼籲船主離開這種上帝審判，會令他們失去靈魂的貿易。他呼籲奴隸商離開這些販賣人口，讓錢財弄瞎他們心眼的貿易。他們呼籲奴隸主停止這種罪惡極深，令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沾滿鮮血的不人道貿易。有些奴隸主會說：「我的奴隸不是我買的，是父母留給我。」但衛斯理指這些人並不因此免受譴責。他指出：

「任何人有權利把別人當作奴隸嗎？一個人只要還能呼吸，他就可以享有自由的權利。沒有任何法律條例可以剝奪他人的自由。自由權利是來自自然律的，我們應將自由歸與那應有自由的，將自由歸還給每一個人。不要讓任何人服侍你，除非他是自願的。除掉所有鞭子，鎖鍊和迫壓；切實實踐「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聖經教導⁴⁴

這篇訴諸社會大眾良心的論政文章令人無法反駁，國會、教會和社會只好冷淡對待，不加理會。

衛斯理天真樂觀和脫離現實的呼籲，沒有帶來即時果效，只有少量基督徒奴隸主回應，作出的釋放奴隸的行動。⁴⁵衛斯理繼續公開表達他的反對立場，透過講道傳遞信息⁴⁶，並召集信徒為廢除奴隸貿易禱告。在往後日子，衛斯理愈來愈

⁴³ 同上。

⁴⁴ 同上。

⁴⁵ Manfred Marquardt, *John Wesley's Social Ethic*, 75。

⁴⁶ 縱使在英國進行奴隸貿易的主要市場，如布里斯本和利物浦，衛斯理仍是一如既往的，在講道中反對奴隸貿易，並不害怕。

愈多參與支持那些反對奴隸貿易的社會領袖，⁴⁷提醒他們小心反對勢力及要倚靠上帝。他離世前最後的一封信，便是寫信鼓勵反奴隸貿易的領袖，他寫道：

「除非上帝的能力把你舉起成為『反抗世俗的亞他那修』，(不然)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夠貫徹反對那可憎之邪惡的榮耀大業。那可憎之邪惡乃是宗教上的醜聞、英國的醜聞，也是人性的羞恥。除非上帝為這特別的目的創造你，你將會因着眾人與魔鬼的抵擋而筋疲力竭。

如果上帝與你站在一起，誰又能夠抵擋你.....，奉上帝的名繼續往前，並且行在祂剛強的能力中，直到甚至連美洲奴隸制度（乃光天化日下最可恥的行動）也要在祂面前消失無蹤。」⁴⁸

這些反對奴隸貿易領袖漸漸意識到必須透過政治手段，在國會中鬥爭才能打勝這場公義的仗。1780年，在貴格會向國會提交廢除奴隸貿易的議案前三年，美國衛理公會，便宣告反對奴隸制度，並認為它與自然律、基督教信仰、人類的愛心和上帝的法律違背⁴⁹。1784年，美國總議會決議，所有本宗教友都要放棄任何與奴隸貿易有關的聯繫及釋放所擁有的奴隸，雖然這些立場被別人攻擊、在執行上因違法而遇上困難，甚至帶來教會的分裂⁵⁰，但這些困難卻沒有阻礙本宗英美教會向國會作出要求廢除奴隸貿易的呈請，用盡方法鏟除這個根深柢固的不義制度。1833年及1865年，奴隸制度最終在英國和美國被禁止。

（3）結構性貧窮問題

1777年，衛斯理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殖民地大臣達特茅斯伯爵，表達英國貧富懸殊問題十分嚴重，警告政府不要在商業和就業的問題上自滿，在信中他表示自己走遍英國，發現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在滅亡中，他們像「行走的影子，四處悄悄遊盪」，充滿仇恨和動亂，蔑視國王。很明顯的，他也將自己捲入另一個關注已久的社會貧窮問題上。衛斯理透過復興運動遍佈全國的班會和宗教會社，提供多采多姿，適切窮人的服務，也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這些事工包括：

「給貧窮人溫飽和住屋；給失業者工作；探望那些貧病的和在囚的；設立新的醫療和教育制度；救濟貧困的；送贈書本給有需要的；對產生結構

⁴⁷ 這些領袖包括：葛蘭威爾，夏普（Granville Sharp），多馬格拉遜（Thomas Clarkson）及威廉韋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⁴⁸ 這是衛斯理一生的最後一封信（1791），正是寫給威廉韋伯福斯，對他作出鼓勵支持。

⁴⁹ Manfred Marquardt, *John Wesley's social Ethic*, 72。

⁵⁰ 同上 頁 72。

性貧窮問題作出質詢。衛斯理不單是服侍貧窮的，他更重要的行動是與他們一起生活，分享生命；甚至因而感染他們的病。因為活像基督就是效法祂，與貧窮人生活在一起。作為基督的門徒，就是要順從祂的命令，去餵養祂的羊，服侍那最小的。」⁵¹

當他與窮人一起生活時，他發現社會對窮人充滿偏見，認為「貧窮是因為人懶惰之故」。他進一步的問，為何我們的社會中有這麼多窮人？我們的政府，政策和制度出了甚麼問題，造成這麼嚴重貧窮？⁵²

他將對社會貧窮問題的觀察和分析，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物資分配短缺的一些思考」。文章指出物資供應不足是出於那些擁有者的貪婪，而不是那些欠缺者的懶惰，問題的核心在於「製酒、重稅和奢華生活」，他將文章投稿在一份晚報中表示：

「為甚麼在英格蘭每個地方都有成千上萬人捱飢抵餓，步向滅亡？我認識真相，有人隔天才錢買點粗食餬口，有婦人從糞堆中撿起腥臭的西鯪魚，帶回家餵養自己及孩子。有人收集連狗兒也棄掉的骨頭，用以熬湯以續殘生。

.....為甚麼不管糧食及土地，甚至差不多任何物品都那麼貴？因為幾乎所有可以數出來的物品都抽了重稅。然而為甚麼稅項那麼高？因為要償還國債。只要國債未還清，稅項必持續沉重。」⁵³

衛斯理晚年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從初期提供直接扶貧服務，發展到為早期工業革命的受害人抗議發聲，他甚至對全國性減貧政策作出一些建議。衛斯理問：為何失業和饑荒遍佈整個英國？因政府政策不公平的照顧貴族地主。政府的圈地政策，使貧富懸殊更嚴重，令窮人生活失去保障，加倍艱苦。地主們投資在回報更高的純種馬匹買賣上，使大批耕地變成畜牧的馬場，由此引致糧食供應嚴重不足，價格不斷提升，農民被迫離開家園，湧往新興的工業大城市尋找生計。由於勞動市場供過於求，失業率達 20-40%，故此薪金偏低，窮人即使找到工作，也無法養活家庭。有錢的人生活奢華，沒有將利潤合理的回饋工人，而龐大的國債和重稅所引發的通脹，令大部分人被迫將所有收入用來購買食

⁵¹ Mr. Douglas Meeks ed., *The Portion of the Poor*, (Nashville: Kingswood Books, 1995) 10。

⁵² 衛斯理，《物資分配短缺的一些思考》“*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Provisions*” (1773)。這也是那位關心窮人，著名的卡馬拉大主教 (Archbishop Helder Camara) 所說的名句：「當我給窮人食物，他們稱我為聖徒。當我問為何窮人沒有食物，他們稱我為（搞事的）共產主義者。」

⁵³ 同上。

物，無餘錢用來購買生財工具，導致家庭式的小生意逐漸消失。衛斯理又問：為何國家通脹那麼利害，如麵包為何那麼貴？因為英國一半的麥已轉去製造利潤回報更高的酒。穀為何那麼貴？因為地主們將大量的穀用作純種馬匹的飼料。牛羊價格為何那麼高？因為他們數量大減，地主轉往投資外銷的馬匹生意。地主們抬高租金，將農田租給失去田地的小農戶，結果小農戶便將增加的租金，轉移到售價上。政府不斷提高稅項，令物價昂貴，為的是要償還發動戰爭而支付的軍費，這些軍費令政府欠下大量國債，最後由窮人支付⁵⁴。

衛斯理認為解決的方法，就是提高就業率和令食物的價格下調，平民才有餘錢買生產工具，打破惡性循環。他認為別無他法，改善貧窮問題是需要政府的干預⁵⁵，因為這是一個公義的政府應盡的責任⁵⁶。他建議政府要：(a) 禁酒，減少對人有害的酒的銷量，以使麥價下降。(b) 增加馬車稅，以減少馬匹的需求，從而降低穀物的價格。(c) 對出口到法國的馬，每匹抽重稅十鎊，使外銷馬匹減少，以便吸引地主轉而飼養牛羊，帶來價格下調。(d) 租金管制，使小農戶在合理的價錢下租用農地，讓雞和豬供應增加而降低價格。(e) 減少軍費開支以減少國債，以便減低稅項。他也希望持有政府債券的富裕人士作出犧牲，減去政府一半國債，好使稅項和通脹下降。(f) 增加就業，使窮人離開苦境。雖然衛斯理對複雜的社會問題過分簡單分析和採取過分樂觀的建議，而未能對症下藥，被政府採用。但他認為在一個極度貧富懸殊的社會，政府的責任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政策，甚至應是一個向窮人傾斜的政府，而不是採取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 所高舉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來解決貧窮問題的觀點是正確的。

衛斯理自六十五歲開始，便積極進入社會性層面的經濟和政治領域，以論政的方式關注人權、自由、正義、貧窮和政府角色等社會事務，相信這些參與經驗和隨之而來的神學反省，令他在「論述蒙恩途徑的重點轉移，愈來愈重視……憐憫工作，視之為所有蒙恩途徑中至為重要的……能重塑並完成信徒的成聖與完全」的生命。⁵⁷

⁵⁴ 許介麟著《英國史綱》(三民書局 2008)，頁 133-136。國的國債因戰爭不斷增加，1717 年國債為 5,400 萬鎊，1763 年國債已升至 10,000 萬鎊。1775 年為 12,600 萬鎊，1782 年增至 23,700 萬鎊，1814 年國債竟高達 85,900 萬鎊。這些因戰爭而來的國債需靠稅收和開拓殖民地市場來支持和償還。

⁵⁵ Theodore Renyon, *The New Creation : John Wesley's Theology Today*, 189。

⁵⁶ 衛斯理在一篇名為《論夫妻之道》的文章中寫下：「公義是政府的生命和靈魂，沒有公義的政府比一具死屍更差」。

⁵⁷ 何威達「論蒙恩途徑：重訪 1740 年之約翰衛斯理」文章，收錄在徐瑞華編《約翰衛斯理的恩典觀》(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2013) 頁 66-67。作者指出這些後期講章包括「論熱誠」1781，「論慈惠」1785，「論探訪病患者」1786。

(四) 信徒藉着參與社會與政治事務達致靈命塑造

靈命塑造的方式很豐富，沒有標準化和劃一的途徑，因為上帝是一位有位格，不是機械化的神，上帝賜給每一個人獨特的生命氣質和不同的信仰歷程，讓人的靈性生命成長。然而在上帝採用不同的途徑賜恩給我們的同時，我們也應選用適切自己的不同方式，親近上帝⁵⁸。在教會過往二千年歷史中，她向我們展示了既豐富又不同的塑造生命屬靈傳統。⁵⁹當我們帶着真誠的信心和愛心去實踐，每一種方式都可令不同的人，經歷到上帝的大愛和真實，帶來生命的更新、改變和成長。

加里·托馬斯（Gary L. Thomas）的著作《與神相遇：認識親近神的心靈路徑》其中一章是「行動主義者：透過對抗愛神」。他這樣寫：「行動主義者實際上是透過戰鬥得到屬靈的餵養……耶穌自己也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約 4:34）……當然我們怎樣作上帝的工，會決定我們是否得到餵養。……只有一種人可以接近正確的方法打主的仗，那就是天生不好戰的人。……不是因為我們喜歡鬥牛的氣味，而是因着為了上帝的緣故，我們必須這樣」。⁶⁰當我們為着上主公平公義的實現，帶着愛上帝愛人的心懷，持續意識地倚賴上帝，而不是靠一己力量去作出抗爭，這個過程必會帶來我們與上帝關係更緊密。因為與不義抗爭涉及面對社會中巨大罪惡權勢，所化身成經濟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並以私利為依歸的社群和組織，它們必定以各種形式的壓力、威脅和利誘等手段迫我們就範，一切都超乎我們力量所能應付的。當我們堅持立場，容許自己暴露在恐懼、失控的險境下，這等危機常會令你產生對上帝的倚靠，這些經驗是平常情況不存在的。在這特別時刻，我們非常需要上帝的同在保證，我們會十分恐懼只有自己獨自面對抗爭，甚至擔心生命的安危。但當我們憑着信心踏上超過我們力量所能面對、為公義抗爭的旅程，並深信祂是一位又真又活，掌管一切的主，我們便常會經歷到上帝信實和奇妙的介入；我們會得着與上帝一起面對考驗和危機所建立的親密團契，我們的生命視野會

⁵⁸ 加里·托馬斯著，陳永財譯《與神相遇：認識親近神的心靈路徑》，（基道出版社,2007）頁 3-11。

⁵⁹ 傅士德著，袁達志譯《屬靈傳統禮讚》，（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1）。傅士德·史雅各合著袁達志，陶婉儀譯《屬靈操練之旅》，（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4）。兩書均以塑造基督生命為中心，展示出在基督教歷史中，基督徒先賢不同的氣質和以不同方式去尋求上帝，彰顯基督的生命。可參《與神相遇》頁 12-23。

⁶⁰ 加里·托馬斯著，陳永財譯《與神相遇》，頁 117。作者轉引自薛華的書《基督徒的標記》，（Francis Schaeffer,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進入一個新的靈性世界，我們的屬靈生命會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但是行動主義者很容易陷入精疲力盡、信心動搖、仇恨憤怒、指控論斷、絕望孤立、驕傲自義等難以避免的信仰危機。故此，參與抗爭行動的人必須常用各種常設的蒙恩途徑，尤其是禱告、默想、崇拜和聖餐等個人和群體的屬靈操練面對試探，與生命和真理的主連結，以便社會抗爭這種「另類」蒙恩途徑，確能帶來美好果效。梅頓（Thomas Merton）指出，這些生活在抗爭中的人，雖然無法整天都沉醉在上帝的同在中，甚至他們的內心和氣質，也不適合過純粹的默觀生活，但只要他們是為了上帝和為上帝的愛而行動，雖然他們是活躍的勞動者，但他們也是半默觀者，因為他們藉着在自己所做和忍受的一切中順服，就如兄弟般的仁慈、自我的犧牲、完全順從上帝旨意，保持內心的極大純潔，他們比自己所知的更親近上帝，他們享受一種「載上面具」的默觀。⁶¹相信最讓我們體會這些載上面具的默觀者，如何藉着參與社會和政治事務達至靈命塑造，應該是一些實踐者的生命見證。

（1）馬丁路德金：為種族歧視抗爭⁶²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下稱馬丁）生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維持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社會，當時的美國南部，歧視、侮辱，甚至虐待有色人種，被大部分人看為天經地義的事。馬丁投入抗爭行動是沒有預先策劃的，他因着勇敢地拒絕走到公車後排就座，便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被推出來領導當時的民權運動。無情的壓力隨即從各方面而來。他經常面對種族分離主義者和聯邦調查員的死亡恐嚇，一個炸彈在他家裏爆炸，每星期都有黑人教會被人縱火焚燒，他的義工被恐嚇、毆打、囚禁，也有些賠上了性命，他的運動籌款工作常遇難阻。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對他採取的方法作出嚴厲，甚至失實的抨擊。他的盟友，「有色人種全國聯合促進會」（NAACP）批評他太激進，但「學生非暴力統籌委員會」（SNCC）則認為他太軟弱。數以十計的城市學生示威，要求他陪他們入獄。密西西比州的義工，則要求他跟他們不顧性命的共同進退。他應集中火力去爭取黑人投票權利？還是改善貧窮問題？那些不公義的法例該以蔑視法庭，公民抗命的形式違反？數不盡的問題和張力在他身邊盤旋。

⁶¹ 梅頓 Thomas Merton, *what is contemplation* (London: Barnes & Noble, 1950) 14-15。

⁶² 楊腓力著，許立中譯《靈魂幸存者》（海南出版社 2010），「馬丁路德金：黎明前的漫漫長夜」頁 13-46。

就在這些抗爭中，排山倒海的壓力下，馬丁經驗了他生命中最重要一夜，他親身經歷了上帝。每當他日後遇到任何壓力超過他能夠應付時，他常常回到這段上帝應許同在的經驗中，支取恩典和力量。事件發生在他領導運的消息宣布不久，三 K 黨的恐嚇便陸續來到，他更被以「超速」罪名關在監獄。驚魂未定的他剛出獄，回到家中坐在廚房思考，他是否可以堅持下去或是辭職不幹，重返他一向嚮往的平靜學術生活。那時約在午夜，他心中非常焦慮和恐懼，家中的電話響起，對方說：「黑鬼，我們現在受夠你和你的把戲，如果你三日內不離開這個市鎮，我們會讓你的腦袋開花，炸掉你的房子。」在隔鄰房間，他的妻子和初生女兒已熟睡。他回憶那一夜的情況：「我坐在餐桌旁，想着我的小女孩，想到她隨時可能不再在我身邊。我又開始想到那位盡心奉獻和忠貞的太太，她就在那邊睡着……我到了一個無法繼續忍受的地步，我很軟弱……。那時我發覺信仰必須對我成為真實，而我必須親身認識上帝。我對着那杯咖啡低下頭來，我永不會忘記……我做了一個祈禱。我大聲的禱告說：『主啊！我在這裏，想做一些正確的事情，但主啊，我必須承認，我現在很軟弱，我正在顫抖，我正在失去我的勇氣。』……就在那個時候，他彷彿聽見一個微小的聲音對他說：『馬丁，為公義站起來，為正義站起來，為真理站起來，我就常與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面對難以招架的罪惡權勢，我聽見耶穌的聲音說：『要繼續爭戰』。祂應許永不離開我，永不會剩下我一個，不、永不孤單。不、永不孤單。祂應許永遠不會離開我，永遠不會剩下我一個」。三天後，正如電話所警告的，一個炸彈在他屋子前廊爆炸，他平靜地面對說：「我幾晚前的經歷，讓我有能力面對它。」

在馬丁往後十三年為公義抗爭歷程中，他曾面對許多危機，也曾有過其他信仰經歷，但在這十三年中，每一個重大的決定，他都回到這經歷，從上帝的應許中支取力量。上帝委派他一個特殊的任務，上帝便應許「我與你同在」。我「與你同在」對馬丁來說；你是甚麼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差遣你，誰帶領你、誰使用你和你倚靠誰？我們看到馬丁是因着社會的不義，也為着上帝的公義和真理投身政治抗爭，經歷到非比尋常的上帝同在經歷。十三年的抗爭的行動，迫使他常回到只能緊靠上帝的關係中，藉着與基督結連，他不斷地得着從上帝而來的信心，勇氣和能力，屬靈生命得着扎實成長。

（2）艾德華貝克神父：為正義而奔跑⁶³

艾德華貝克神父（Edward L.Back）（下稱貝克）是上世紀美國苦難會（Passionist）會士，二十一歲加入修會後，隨即被派往芝加哥接受神學訓練。在神學院中，他結識了一位名麥克的修士同學。有一天麥克邀請他參加呼籲釋放在南非受到監禁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示威遊行，貝克神父表示從未參加過示威活動，尤其是知道這次示威可能會遭到逮捕。他正猶疑之際，麥克便說：「我想不出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去實踐你所研究的神學」。結果貝克神父便開始了他第一次為爭取社會正義而站出來的示威活動，隨後他繼續為那些被剝奪公民權，在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中被拋棄的窮人抗爭。貝克神父表示，「他與這些無私地參與示威的人並肩作戰，而被他們深深吸引」，藉着這些被壓迫的人，「我發現了一個我不曾生活過的世界，我懷疑自己這麼多年來，為甚麼沒有發現。我當然知道有人活在社會邊緣，但現在他們卻生活在我眼前。」

這群為反抗社會不義制度而獻上之人的熱情，繼續激勵他，於是他也加入了為他們辯護論戰的行列。為了更熟悉這個他為之奮戰的羣體，他以未曾有的熱誠，融入非裔美國人的經驗中，他「讀他們的歷史，聽爵士音樂，吃他們喜嗜的食物」，就是這樣，貝克神父說：「我逐漸以不同的眼睛去看他們，我迎向一個新的世界。」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接觸，是在我的信仰體驗，和天主教誓願裏所缺少的。……當然我有幸得到召喚進入修會，過着『神聖的』隱修生活，穿着會衣一起禱告，但是耶穌最重要的教訓，正是去幫助那些跌倒的人。祂站在會堂面前，展開先知以賽亞的書卷，祂講的不只是祂的道，也是我們的道。……現在正是我的機會，不是坐着談論如何成為祂的信徒，而是真正地追隨那位使我如此着迷的耶穌的行動。窮人、被俘虜的、受壓迫的就在我面前，而我願意和他們一起抗爭，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為他們傳報喜訊和自由，我開始想像自己是個城市的傳教士。貝克神父也加入了「世界糧食協會」（Bread for the World），那是一個關懷世界飢荒的組織，呼籲人們以信息和實際的行動去對抗疾病飢荒。這群尋求正義的人告訴貝克神父一個他十分陌生的世界，促使他去關心那個世界。這些人督促他去行動，也讓他停下來反省。參與爭取社會正義行動，貝克神父認識到社會正義是耶穌最重要的教訓，沒有一個自稱是基督的跟隨者，卻不實踐這個信仰。貝克神父表示，「這群為公義而奮鬥的人，使他成

⁶³ 艾德華貝克著，林宏濤譯《神在人間》（高國出版，2002）頁 117-136。

為一個更好基督徒，要求他不斷超越自我」。

上帝藉着貝克神父的社會政治參與，為他掀開一個過往屬靈生命未曾進入的新世界，他看到自己屬性生命的貧乏，他找到委身信仰的場所，他找到實踐使命的信仰和對象。社會政治的參與成為他的蒙恩途徑，使他更明白耶穌的呼召，樂意對社會中的困苦者作出承擔，引領他的信仰生命更成長，更豐盛（當然我們不要忘記他是一個每天進行有規律地崇拜、默想和祈禱等屬靈操練的修士）。

（3）朱耀明：為民主民生奮鬥⁶⁴

朱耀明為香港一位浸信會牧者，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開始在柴灣區工作。當時的柴灣是一個十分落後的社區，住滿木屋、石屋和公共房屋的基層市民，區內醫療和交通建設嚴重不足，他漸發現有些社區問題，不是他單獨一人能夠解決。為着改善往外區域的交通，他開始與居民及區內教會團體一起，向政府爭取興建東區走廊。隨後向政府爭取醫療設施改善和興建一所該區的醫院。這些早期的參與使朱牧師被視為一個壓力團體的代表。

朱牧師第一次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內心出現三個憂慮。他所屬較為保守的禮拜堂會友如何看待他？他的同工怎樣看待他？當時禮拜堂正向政府申請土地建堂，政府會不會視他為壓力團體之一而影響教會的申請？當年這些擔心讓他回到福音書尋找答案。他說：「基督的信仰鼓勵他要道成肉身，教會應該與市民同行，與貧苦的人一同面對困境，使他們得着支持。」但他問，若我們不投入社區，市民又怎知道耶穌基督道成身呢？一刻間，他體會到心內的顧慮，與他對耶穌的信仰是無關係的，故他決定衝破顧慮，踏上參與社會運動之路，為居民爭取福利，為改善社區發聲。

爭取改善社區醫療設施的不足，要求設立一所醫院，很快便獲政府正面回應，十年後醫院建成。爭取改善政府房屋政策，容許單身人士（當中不少是貧窮老人）申請公共房屋。他參與示威，在政府部門外靜坐露宿，結果爭取了十五年才獲得政策改善。

⁶⁴ 部分資料來自駱穎佳編，龔立人、吳國明等著《遙遙民主路—回歸前後香港基督徒的政治評論》，（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2004）。部份資料來自朱牧師口述。

一九八四年因着中英聯合聲名的簽定，香港在九七年回歸中國，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政策下建設一個民主法治的特區。朱牧師由此開始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爭取「八八直選」。一九八九年加入「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及被選任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常務委員。2002年與一群學者和專業人士組成了「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爭取2007年及2008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2003年，參與「七一大遊行」，反對為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條例立法。2013年參與「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落實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朱牧師為三位發起人之一。

在愈來愈多社會政治參與中，朱牧師表示常有來自教會、信徒、外界人士和「敵對團體」的壓力、中傷和挑釁，他的信仰常面對嚴厲挑戰。他表示：「在教會四幅牆內所強調的愛心和信心是未經考驗的，真正的考驗是為着信仰，將愛心和信心實踐在爭取社會公義當中，社會才是實踐基督徒信心和愛心的場所。」朱牧師又表示：「在參與改革社會的抗爭過程中，我們體會到那些在不公平，不合理制度下的人痛苦地生活，我們的心會被他們苦況觸動，被觸動的憐憫心腸會產生愛心的行動，在實踐愛的過程中，我們的愛心會更易被觸動而增長。我們的信心在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抗爭過程，也常受到考驗。面對四方八面而來的壓力，面對內部意見的嚴重分歧，我們常看不到成功的機會。如何能夠在無希望中仍存盼望？那是來自我們相信有上帝與我們同在，相信上帝在我們一邊公義最終必定勝利。」

參與社會與政治事務，不斷擴闊朱牧師生命的視野和找到聖徒相通的團契生活。他說：「在為公義抗爭的過程中，他因着需要而經常閱讀，這些書籍成為了他的靈友，帶引他回到先賢的腳蹤，體會到我們並不是孤單的。」歷代先賢的信心和堅持，不斷地擴闊他的生命、信仰和視野，給他很大的鼓勵和動力。他深信社會政治行動，若沒有禱告和上帝話語，這些行動很快會被重擔所拖垮，所以他會與他的伙伴，每次會面商議前都一起祈禱，以聖經的話語互相鼓勵支持。這是一個常能帶來轉化信仰生命的恩典行動，因為每當群體面對困境，上帝的話語便在群體中帶來堅定的信心。無論風浪多大，我們仍是一起站在可靠穩妥的磐石上。

(五) 總結：結合敬虔工作與憐憫工作，塑造整全的生命

衛斯理在信仰成熟期，愈來愈將憐憫工作看為重要的蒙恩途徑，他的憐憫工作也開始從個人慈惠活動，進入社會政治性的道德抗爭行動。相信他會同意聯合國祕書長韓瑪紹（Dag Hammarajold）的觀點：「通往聖潔之路，必須途經行動的世界。」相信他也逐漸認識到「若我們不肯與那些造成『貧困』的人士和制度對抗，就無法與窮人一同受苦……與受欺壓的人團結一致。只有「憐憫」而沒有「對抗」，就很快會退色成無濟於事的同情」的道理。⁶⁵然而任何使用蒙恩途徑的人，都容易跌入操控運用它和扭曲它，將過程變為目標的危機。「因為一切外在途徑，只要與聖靈脫節，就完全無益，它們不但不能幫助人更認識上帝，也不能叫人經歷上帝的愛。……一切外在途徑，除非有上帝在裏面工作，或是通過它們進行工作，否則都是無力可憐的。因此如果有人認為這些途徑有它內在的能力，就是大錯特錯……所有權柄都在於上帝，是祂通過這些途徑祝福我們的靈魂。」⁶⁶故此使用的人要經常帶着等候、信靠，仰望上帝憐憫的心，小心避免誤認為上帝恩典會因着我們使用蒙恩途徑，機械式的必然臨到。

以抗爭行動實踐憐憫工作的人，正如上文所提，常面臨很多潛在的試探與危機，⁶⁷所以我們必須要對靈性生命的塑造，有一個整合，健康和平衡的發展觀念，才能避免蒙恩途徑變成危害靈性生命的陷阱。彭順強引用以利莎伯奧康諾（Elisabeth O' Connor）對聖靈生命的洞見指出，「靈命塑造需要『向內靈程』（Journey Inward）和『向外靈程』（Journey Outward）的結合。『向內靈程』是一個尋找在我們裏面內住的基督之旅程，『向外靈程』是一個尋找在我們中間和在世界內住的基督之旅程。向內靈程需要獨處、安靜、禱告、默想。……在群體和使命的外向靈程卻需要關懷、憐憫、見證、外展。……這兩個靈程是互相增進，永不能分開的。」⁶⁸故此，藉着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來塑造靈性生命的人，必須全面和經常的使用「常設的蒙恩途徑」和其它「審慎的蒙恩途徑」來檢視自己的生命狀況，祈求得着聖靈的光照，面對自己的黑暗軟弱，領受恩典，經歷上帝

⁶⁵ 彭順強著《盧雲的誠與愛》，（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2013）頁 331。

⁶⁶ 衛斯理講章 第 16 篇「蒙恩途徑」（1746）。

⁶⁷ 加里托馬斯著，陳永財譯《與神相遇》指出，「行動主義者」常遇的試探包括自大、自義、論斷、操控、驕傲、追求外在的成就等等，頁 124-127。傅士德著，袁達志譯《屬靈傳統禮讚》其中一章「社會公義傳統」指出一些追求公義者的潛在危機，頁 190-192。

⁶⁸ 彭順強著《盧雲的誠與愛》頁 244，資料主要取自以利沙伯·奧康諾 1968 年出版的名著“*Journey Inward Journey Outward*”。

的大愛和同在，以便在世上活出聖潔生命。

參與抗爭的人使用蒙恩途徑時，當中尤為重要的，是有規律的禱告生活。衛斯理深信，禱告是「接近上帝的最好方法」，「少了個人禱告，其他的蒙恩途徑對他們就沒有益處了。」⁶⁹騰出時間和空間安靜等候的禱告，「是預備好我們內在的空間，讓上帝可以用轉化一切的愛來觸摸我們」，「在這些時間和空間，我們能夠省察和回應上帝恩典的同在。」⁷⁰禱告使參與抗爭的人與上帝的關係緊緊連結，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得着上帝的指引，聆聽上帝微小的呼召和聲音。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蒙恩途徑，就是在群體中領受聖餐。我們在奮鬥過程中常出現懷疑，甚至是不信，基督徒在聖餐裏的團契便可以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我們知道我們不孤單。聖餐中的上帝救贖奧秘會深化我們的信仰，堅固我們的盼望及淨化我們的愛心。聖餐禮告訴我們基督為人受死，好叫眾人可以活出豐盛生命。效法基督那份無條件的愛，激勵我們立志在世上成為活祭⁷¹，所以衛斯理認為聖餐是「偉大的蒙恩途徑」，是「上帝所命定的，祂通過這聖禮，按着人不同的需要，施予恩典，不論是攔阻恩典，稱義恩典和成聖恩典。」⁷²我們可以在聖餐中找到「聖靈與大能」。⁷³當然信徒在參與抗爭行動中，帶來恩典和能力的屬靈操練，還有查考聖經、公共崇拜，基督徒團契等等。沒有經常使用這些常設恩典途徑，參與社會政治行動，最後很可能令人無法避免陷入權力和利益的渴求和操控中，或墮入令人絕望、毀滅性的自義仇恨中，結果是參與社會和政治改革爭取公平正義的行動，反而變成一條從光明走向黑暗的絕路。

但願循道衛理宗的信徒的信仰是平衡、整全和扎實的，同樣着重及經常委身常設和審慎的恩典途徑，尤其是透過爭取公平正義的社會行動，領受恩典，活出基督徒聖潔完全的生命，並以此作為本宗信徒的一個獨特的屬靈記號。

⁶⁹ 衛斯理，《日記》1772年9月4日。

⁷⁰ 彭順強著《盧雲的誠與愛》頁186-187。

⁷¹ 同上 頁230。

⁷² 衛斯理，《日記》Jackson ed.第一集 頁288。

⁷³ Randy L maddox, *Responsible Grace*, 203 轉載衛斯理查理士的話：「啊，請不要再告訴我在這賜生的靈糧裏，找不到耶穌我主的聖靈和大能」。